



为什么国家间会进行贸易

Brad McDonald

如果说有什么事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一致同意的，那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让世界变得更好。然而贸易却又是最具争议的政治话题，在一国国内和各国政府间皆是如此。

当企业和个人购买产自国外的价格低廉的货物或服务时，两国的生活水平都上升了。促使消费者和企业购买国外商品的理由还包括：该产品可能比同类的国内产品更符合他们的需求，或者国内根本就买不到。国外制造商同样从中受益——它们不仅在本国创造出更高的销量，并且还赚取到外汇，这可以用来购买外国制造的产品。

不过，在国家间进行贸易时，即使社会整体获得了收益，也并非每个人或每家公司的状况都变得更好。如果一家企业因为更便宜的价格而购买外国产品，那么它将从中受益，但（售价更高的）本国生产者却失去了销量。可是，购买者的获益通常要高于国内销售者的损失。一般而言，当各国进口国外的生产效率更高、更为便宜的产品时，整个世界的状况会更好。例外情况是国外产品的成本不包括社会成本，例如污染。

但那些认为受到外国竞争的负面影响的人长期以来一直在反对国际贸易。在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奠定自由贸易的基础后不久，英国历史学家Thomas B. Macaulay观察到政府在决定是否采纳此种观念时遇到了实际困难——“自由贸易是政府能够给予民众的最大福利之一，然而其在几乎所有国家中都不受欢迎”。

两个世纪后，关于贸易的争论仍在继续。

为什么国家间会进行贸易

李嘉图发现贸易受（生产货物的）相对成本而非绝对成本的驱动。一个国家可能在所有货物上都有着比另一个国家更高的生产力，这就是说在生产相同货物时，它比其他国家所需的投入（例如资本和劳动力）更少。李嘉图的洞见是，即使是这样的国家也能从贸易中获利。这源于它的比较优势——出口那些最具绝对优势的产品，并且进口那些绝对优势相对较小的产品。

即使某个国家在服装制造上的生产率是其贸易伙伴的2倍，如果它在钢铁和飞机制造上的生产率是后者的3倍，那么它仍将受益于在制造和出口这些商品的同时进口服装。该国的贸易伙伴（具有比较优势而没有绝对优势）将从出口服装和换取这些产品的贸易中得利。比较优势的概念还从实体货物贸易延伸到了服务的贸易，例如编写计算机程序或提供金融产品。

因为有了比较优势，两国都因贸易提高了生活水平。Douglas Irwin（2009）将比较优势称为经济发展的“福音”。“即便发展中国家在任何领域都缺少绝对优势，但总归在某些产品的制造中具有相对优势”，而这能使它们在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中获利。

比较优势的不同有多种成因。在20世纪早期，瑞典经济学家埃利·赫克歇尔和贝蒂·俄林指出了劳动力和资本（其被称为要素禀赋）的作用，他们认为这两者是优势的決定因素。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强调各国倾向于出口那些生产过程中使用了相对丰富的要素的产品。资本（例如厂房和机器）丰富的国家出口资

比较优势

即使某个国家在任何方面都更加高效（具有绝对优势），贸易仍能使其受益。考虑以下的例子：

A国：每小时劳动者能生产3千克的钢或两件衬衫。B国：每小时劳动者能生产1千克的钢或一件衬衫。

A国在这两种产品上都有优势。现在假设B国提出用两件衬衫换取A国的2.5千克钢。

为了制造这额外的两件衬衫，B国从炼钢中抽取了2小时（减产2千克钢）。A国从衬衫生产中挤出了1小时，这1小时被其用来多生产了3千克的钢。

总的来看，如今生产的衬衫数目相同：A国少生产了2件衬衫，但B国多生产了两件。但是，钢的产量比以前增加了：A国多生产了3千克钢，而B国少生产了2千克。多出来的这1公斤钢就是来自贸易的收益。

本密集型产品，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如今，经济学家认为，尽管要素禀赋很重要，但还有其他因素对贸易模式有着重要影响(Baldwin, 2008)。

最近的研究表明，一旦贸易放开，随之而来的调整不仅有跨行业的，还有行业内的。来自外国企业竞争的增加给利润带来压力，迫使效率低的企业为效率高的企业让路。扩张和新进者带来了更好的技术和新的产品多样化。可能最重要的是，贸易使我们在不同类型的货物（如电冰箱）间有了更多选择。这解释了行业内贸易（例如，出口家用电冰箱的国家可能会进口商用冷却装置）的盛行，这是要素禀赋理论无法解释的。

带来更多产品的贸易显然有着效率上的益处——不仅相同的产品增加，而且产品多样性也得到提高。举例来说，美国进口产品的多样性（例如不同类型的轿车）是20世纪70年代的4倍，而供应每种货物的国家数量也翻番了。更大的收益可能来自投资支出效率的提高，这是由于企业能够获得种类更多、质量更高的中间投入和资本投入（考虑光学镜头而不是汽车）。

用以解释贸易影响的经济模型通常忽略了技术转移以及推动竞争的力量，比如产品多样性的扩大。这是因为这些影响很难模型化，而与之不符的结果受制于更大的不确定性。但当这种不确定性发生时，研究者的结论却是这是贸易改革，如削减关税和其他非关税贸易壁垒，带来的收益远大于传统模型所体现出来的。

为何贸易改革如此困难

贸易为全球效率的提高做出了贡献。当一国开放贸易时，资本和劳动力向那些效率更高的行业转移，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也随之提高。但是这些效应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贸易同样给某些企业和行业造成了混乱，而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企业常常为反对贸易游说，它们的工人同样如此。他们经常寻求进口税（被称为关税）这样的壁垒，并且呼吁提高价格或限制进口品的可得性。加工者可能尝试限制原材料的出口，以自动下压他们自己的投入要素的价格。相反，贸易的收益是分散的，其受益者经常不清楚贸易是如何使其受益的。

贸易政策

二战以来，各种改革大大地降低了政府施加的贸易

壁垒。但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却也相应地出现变化。贸易壁垒在特定部门（例如农业和服装制造业）和特定国家集团（例如不发达国家）间更是非常之高。许多国家在交通、通讯和金融部门这样的服务领域的贸易中设置了诸多壁垒，其他的国家则制定了鼓励外国竞争的政策。

此外，贸易壁垒对某些国家的影响比其他国家更大。往往受冲击最大的是欠发达国家，其出口品主要是工业化国家所保护的低技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以美国为例，其对某些主要西欧国家的产品每1美元收取1美分的关税，然而该国却对从孟加拉国进口的每1美元产品收取大约15美分的财政性关税（Elliott, 2009）——即使某种进口自孟加拉国的特定产品面临来自与西欧相似类别的产品相同或者更低的关税。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计算表明，低收入国家面临的贸易壁垒平均比那些主要发达国家高50%（Kee、Nicita和Olarreaga, 2006）。

2001年，在卡塔尔的多哈，世界贸易组织（其为国际贸易提供仲裁）的成员在一系列谈判中就降低并消除政府施加的贸易障碍进行了艰苦的努力。这些谈判涉及的议题十分广泛，其中有很多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包括消除残存的农产品出口补贴，限制国内农业补贴，大幅削减发达经济体对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关税。多哈回合同样致力于解决其他关键议题，例如服务业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在渔业补贴和反倾销等领域的贸易法案，以及关税和贸易便利化。

如果成功，多哈回合每年将产生几千亿美元的收益。但某些团体还在寻求拖延和削弱该协议。对更大收益以及有助于相对降低不利影响的方式的关注能够促进贸易体系的公平，并使其在经济上更加合理。■

Brad McDonald是IMF战略、政策与检查部副主任。

参考文献：

Baldwin, Robert E., 2008, *The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of Heckscher-Ohlin Trade Models: A Review*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Elliott, Kimberly Ann, 2009, "Opening Markets for Poor Countries: Are We There Yet?"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184* (Washington).

Irwin, Douglas A., 2009, *Free Trade Under Fir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rd ed.).

Kee, Hiau Looi, Alessandro Nicita, and Marcelo Olarreaga, 2006, "Estimating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ice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840* (Washington).